

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城市接管*

杨丽萍

[摘要]解放战争后期,大城市的接管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迈向执政的重要过渡。上海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奠定了它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为了完整而平稳地实现对上海的城市接管,中共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安排。然而,面对陌生的城市环境、急剧变迁的社会,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这场接管充斥着各种新的情况和新的矛盾。为了顺利实现接管,新政权不可避免进行着各种适应、斗争,甚至妥协。

[关键词]上海;接管;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5-0063-06

解放战争后期对大城市的顺利接管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解放战争开始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接管工作随即展开。上海作为远东最大、人口最为密集的城市,是国民政府经济上的半壁江山。三大战役结束后,上海的接管工作在即。面对政治、社会的急剧转型,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自身角色、使命的转换,能否实现对上海的顺利接管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执政和站稳脚跟的关键之举。

一、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的认识及理念

作为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城市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城市中心论”^①深信不疑。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条件,使共产党人能够在广州、武汉等大城市进行公开活动,并参加了攻打大城市的北伐战争,甚至在上海成功地领导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脱离“城市中心论”的思维。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城市中心论”在党内一直存在,其中尤以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及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期间为甚。

例如,李立三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

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1]6-577}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人制定了全国中心城市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李立三和王明等人的“城市中心论”及其冒险使得中国革命力量最终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几经周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当然,走向农村并非意味着放弃城市,夺取城市仍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重要目标。

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再次提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2]6-249}同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重申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各局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3]6-249}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抗日战争

* 本文系2013年度上海市阳光计划“建国初期上海群众路线实践研究”[13YG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丽萍,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① 所谓城市中心论,主要是指主张革命发展道路以城市为革命中心、以工人阶级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和平时期在城市进行合法斗争;在革命时机成熟时,在城市举行工人起义,先占领城市,后进攻乡村,即瞿秋白所说的“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形式。

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2]p.977}

1945年,抗日战争形势逐渐明朗,随着日军战线的收缩,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军事压力随即缓解,城市工作亦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同年4月,看到了抗战胜利曙光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要有这个准备,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铁路、工厂、银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实际地去做。^{[4]p.595}

尽管中共中央对城市工作高度重视,特别是解放战争打响以后,城市接管工作变得迫切而现实。但经验的缺乏和执行层的农村根据地思维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早期的城市接管工作问题不断。

随着新解放区的拓展,长期扎根农村、惯于农村工作的干部一时无法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他们积极地发动城市群众开展翻身运动等革命,一些资本家受到批斗,生产物资遭到哄抢,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恐慌。194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面提出了各地各军在执行党的新区城市政策时应注意的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应是针对当时出现在各个城市接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它们包括:(1)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2)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3)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4)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5)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要等城市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6)必须有计划地处理大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7)必须妥善清理和登记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8)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 and 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9)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5]pp.1323-1324}可以想见,电报中所反映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中至关重要且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针对以上及其他接管城市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

领导人不断提醒全党提高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认识。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5]p.1333}

中共中央的重视,以及相关政策、方针的跟进及时缓解了各种矛盾。在后续的城市接管工作实践中,接管工作人员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终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城市管理经验和城市接管政策体系。在接管城市的经验中,石家庄和沈阳是两个典型代表,并最终形成了著名的“石家庄经验”和“沈阳经验”。特别是“沈阳经验”,接管人员创造性地总结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方法,这一经验成为此后城市接管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平津战役后的城市接管工作中,中共中央又陆续下发一些政策文件,使得城市接管政策体系最终成型。这些政策包括:《中央为平津前线司令部起草的入城布告》、《关于入北平不再发任何宣传口号和不能把农村土改办法施行于大城市郊区的指示》、《关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工资问题给北平市委的指示》、《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决定》、《关于北平各机关旧职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关于天津税收暂时照旧收税的指示》、《关于私营工厂复工等问题给天津市委的指示》、《对北平市报纸、杂志、通讯社登记暂行办法的指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等等。

上海的顺利接管仰赖于这些成功的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在城市的接管过程中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办法、策略,有效地应对了各种突发状况,从而实现了对上海的成功接管。

二、上海的城市接管

在三大战役进行过程中,国民政府的崩溃速度远远超出了共产党人的预期。全国范围内大小城市的接管工作几乎蜂拥而至,这其中就包括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以及经济文化中心上海。一些早期接管的大城市在接管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醒中共中央,农村革命的方法和路径是无法在城市复制的。然而,管理思维模式的转换尚需时日,干部人手的紧缺,以及城市接

管具体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都使得城市接管工作成了一场不断适应、调整的复杂历程。

(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

上海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格外审慎。历史事实证明,上海就像一块政治试验田,从开埠以来它就接受了无数次制度的试验,谁征服了它,谁就将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大财政机器。毛泽东更是指出:“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有全党全世界性质。”^{[6]659}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在接管上海前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这些具体工作包括人员的联络和配备,情报的搜集、整理与分发,以及推出相关政策、法规。

首先,联系中共地下党组织,扩大地下党组织的网络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大革命时期受到破坏而长期薄弱。1949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开始发动群众,开展保护工厂、机关、学校的工作。“有军、政权工作经验的人民解放、解放区干部,与熟悉情况、联系群众的地下党、广大地方干部结合,这是顺利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重要保证。”^{[7]64}于是,潜伏的各个基层地下党组织开始积极发展新党员以充实接管力量。例如,潜伏在旧警察机构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解放前夕,短期内发展党员到500余人,迅速扩大了警察系统的地下党组织。^{[7]68}除了扩大自身力量之外,中共中央还积极开展对民主党派等社会中上层人士的联络。对此,早在接管上海前,党内已有了共识:“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工作”,同时,“亦必须有一部分党外文化工作者参加接管”。^{[8]627}

帮会力量在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共产党人也十分注重与帮会人士的联络。正是基于对上海各色势力的准确判断并提早进行了安排,才使得上海的接管工作避免了诸多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在整个上海的接管工作中收到良好效果,使接管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其次,对接管人员进行调配和集中培训,提高其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早在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指示要求:华东、华中应即调动集中和训练

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江南城市;要求华北局调集1.7万名干部,首先集中8000人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向江南前进;另要求东北局应准备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沈阳、天津、北平都准备抽调相当数量的城市工作干部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9]64}在接管上海前,中共中央调拨8000余人,组建了“南下干部纵队”。这支队伍主要由华东局干部,山东、苏北解放区党委、地委、县委配备的党政军整套人马,以及部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撤退干部组成。同时,华东局还通过创办警官学校,短期培训上千名青年学员,会同由各解放区公安、保卫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公安保卫干部队伍,专事接管上海警察局和组建人民公安机关。

在进行人员调配的同时,对现有接管干部进行思想和业务能力方面的培训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据亲历者回忆,“从1948年11月下旬我们第一批学员进华东局党校算起,到1949年5月27日进入上海接管,我们全部学习时间约为6个月”。“首先是学习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通过听辅导报告和自学、小组讨论,我们认识到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继《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之后,根据新的形势,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10]6149}除此之外,接管干部还学习了《城市政策汇编》第一、二辑。中共山东分局编印的《政策汇编》。1949年5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纪律的指示》、《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外交纪律的七项规定》。其他学习文件还有第三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入城守则和纪律》等。

除了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之外,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地出台了一些管理方针和政策。陈毅作为接管上海的主要领导,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接管政策和方针,其中包括《关于接管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接管部门还准备了“上海市军管会”臂章、汽车临时通行证等证件,严格规范政权交接的秩序。1949年4月25日,就在接管上海前夕,中国人民解将军宣布了《约法八章》,这是解放上海、接管上海的总政策。^①

①《约法八章》内容包括:(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3)没收官僚资本。(4)保护一切公私立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以逮捕,不加侮辱。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6)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7)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应当废除。(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7-1459页。

《约法八章》等各项接管政策对人民解放军是一约束,对于上海市民则是人民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这些管理法令的宣传和贯彻,对稳定社会情绪,动员各界人士,调动一切有利因素,顺利平稳地接管上海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接管干部也正是在学习这些政策、方针和法规的过程中,认识了城市管理的特殊性,逐渐扭转了农村工作的惯性思维。

随着人事调配和相关培训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上海接管也进入倒计时。接管上海意味着上海全新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的重构。

(二)上海的城市接管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深沉的革命思维,改造社会的理想正是这种革命思维的集中体现。然而,当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实践它的全面改造社会的理想时,他们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如果你们到了上海,大粪三天没人倒,全城到处发臭,怎么办?全世界人民看着,共产党怎么办?帝国主义更是冷眼相看的。”^[76]社会生活是由吃穿拉撒这些琐碎构成的,合法性和政治统治的顺畅性等宏大命题恰恰是由这些基本日常生活内容搭建起来的。现代城市是一个高度复杂、多功能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实体,城市人口集中,社会阶层复杂,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尤其是上海,分工细致,生活丰富多样,内外联系紧密,经济完全商品化。这些主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必须转换思维,必须着眼于实际,“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在上海解放后,如何把城市接管好,管理好,使城市生活迅速正常化,工厂开工,商店开门,学校上课”。^[76]换言之,稳定大于一切。

1949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写的复电中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农村的方式。”“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5](p.1405-1409)}同年5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丹阳召开会议讨论接管上海的问题。

丹阳会议主要讨论了接管上海的四个重大问题,包括:(1)人事、组织安排;(2)入城政策纪律;(3)人民生活安排(米、棉、煤);(4)统战政策(如何稳定民族资

产阶级,恢复生产)。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权平稳交接的主旨。

5月24日晚,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即成立。

接管大致分为接收、管理和改造阶段。“接收阶段的工作,包括清点移交,要求不打乱、不影响工作与业务的继续。管理阶段主要是进行研究、考察,开始局部改造和整编。改造阶段则全盘肃清原来的反动制度,巩固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制度。”^[76-23]

如前所述,为了平稳交接,实现上海政权的顺利接管和社会安定,上海的接管工作吸取了以往大城市接管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原封不动地先行接管,逐步进行改造”的原则,不仅机构,包括人员都采取了保守稳健的接管策略。同时,为了弥补城市实际管理经验的不足,中国共产党广泛吸纳原国民政府旧人员加入城市管理。正是上海留用的原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保障了上海的正常运转。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赵祖康先生的及时任用,极大地安定了原在国民党市政府供职的许多工程技术、医务卫生、市政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和人才”。^[76-19]在上海的接管工作中,计接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各局处,合计旧人员49000余人,“除有一小部分逃跑或转入潜伏以外,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在全国革命胜利形势和党的政策感召下,留原岗位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经过长期教育和思想改造,大都成为新中国的干部”。因此,“文件档案、财产器材都比较完整地转到人民手中”。^[76-9]除此之外,财经方面,接收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411个,员工153000余名。文教方面,大专院校26个,教职员2796人,学生8109人;中等教育机关503个,教职员5000余人,学生17万余人。^[176-2]

三、上海接管后的城市管理问题及其应对

就在中国共产党人对上海进行接管的同时,不甘退出上海政治舞台的各方势力也在进行最后的挣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负隅顽抗,散兵游勇的为非作歹,这些都成为上海接管后人民政府进行城市管理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上海接管后面临的各种斗争

尽管经历了内战的巨大消耗,上海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少。

上海解放之初,城中到处游弋着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除了惯匪、流氓,以及黑社会势力之外,溃散在上海的国民党官兵就达2万余人,国民党有计划潜伏的特务组织人员计3万多人。^{[12]p.455}当时,还有身份不明者冒充中共地下党组织或游击队的。如新成、长宁区有所谓“江南挺进军”、“革新军”,沪南区有“解放军先遣队”、“中国民主联军”、“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突击队”等。^{[13]p.187}这些散兵游勇依恃手中掌握的武器,纠结帮会分子、流氓地痞企图浑水摸鱼,伺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除此之外,一些报纸也乘机散播不实言论,制造恐慌。

即使是接受接管的留用人员,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观望态度。据调查,“当时留用警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相当复杂。有些员警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转变了立场,靠拢了我党;但是大多数员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心存疑虑,徘徊观望;少数人对共产党仍持对立的态度,有的甚至依然持反动立场,阴谋反抗”。^{[14]p.91-92}

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政府发动统战优势,利用党外力量来树立人民政府的公信力,逐渐清除了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影响。人民政府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其中包括91个团体会员,推选社会中上层知名人士为理事,出版报纸,进行宣传联络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宣传内容主要是当时的形势与任务,以消除群众的顾虑,推动社会中上层人士在各工厂、企业、单位与职工一起护厂、护校、护机关。^{[13]p.182}

同时,人民政府逮捕和惩治了一批危害社会治安的人员。据统计,1949年6—7月,公安部门和警备部队共逮捕残敌、特务、盗匪2560多人,扫除市区及近郊地雷24900多个,拆除碉堡18000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000多人(内军官2700多人),救济疏散因战争和灾荒逃来上海的难民30多万人,使其返乡参加生产。^{[7]p.25}

在经济领域,中国共产党也面临挑战。自国民党时期起就存在的物价问题始终困扰着上海的发展和稳定。相关研究颇多,此处不再赘述。除了客观原因外,接管上海后的城市管理中还存在许多主观问题,这也制约着上海的接管工作。

(二)上海接管后,接管人员管理城市方面的诸种不适

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其他问题。

第一,全能型高统合取向的管理模式因政治资源

的匮乏而使城市管理面临困难。在特殊的革命年代,为应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对人力的高度动员和依赖基础上。解放战争后期,大量城市的接管导致干部队伍人数严重不足,而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向来比较薄弱。据统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留在上海的组织力量极为有限,解放前夕党员人数仅有8000多名。^{[14]p.11}1949年7月,上海仅有党的基层组织717个,党员17602人,其中随军进入上海的党员不过9964人。^{[15]p.762}而相较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各种地方势力组织程度更高,群众基础更加扎实,影响力更大。

第二,中国共产党缺乏管理大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比较现代化城市的经验。作为长期活动于农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经验极为缺乏,在早期为数不多的管理占领城市的经历中也是问题不断。例如,1930年攻克长沙后,红军没收和平分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商人的财产,烧毁了一些私人住宅,甚至把一些穿大褂、西装的人当作土豪劣绅或国民党公职人员杀掉了。^{[16]p.16}1947年7月,石家庄解放,但“在接管城市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一些士兵不仅乱拿东西,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搬去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他们还笼统地提出工人、贫民当家,工人武装及翻身等口号……有的还在大会上使用肉刑,甚至打死人。这些做法在全市引起了恐慌”。^{[16]p.17-18}为此,中共中央下发相关文件,纠正城市接管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48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工商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党在这个问题的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5]p.1285}

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强调,但惯性思维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纠正。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思想问题解决了,人才和干部的匮乏仍然制约着人民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水平和效能。

这就是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所面临的上海市管理生态。一方面,上海具有一个超大的城市空间,其内部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这一现实激发了人民政府对于社会管理强控制的诉求;另一方面,人民政府却又极其缺乏城市管理的干部,以及其他政治资源。这就决定了人民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必然寻求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路径来应对眼前的困难。

(三)调适与困难应对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

一个“总体性危机”。这一危机早在晚清时期便已开始，危机的形成是由于整个中国的政治解体与社会解组同时发生。^①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面对国内外极其严峻的各种挑战。如前所述，在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且具备极强的资源动员、配置和调度能力的管理体制来实现对根据地的管理。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紧迫的城市管理需求，在没有其他可靠替代设计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只能复制革命年代的管理模式。

为此，国家首先要实现对社会有限资源的全面占有和控制，进而实现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管制和干预。适应于这一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城市社会都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于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从而实现了对城市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和整合，达到了稳定社会和巩固政权的目的。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政府的执政基础愈加坚实。新干部的发掘和成长，以及通过组织化而动员起来的强大群众力量使得人民政府得以对接管城市时遗留的各种问题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全新的城市管理框架和制度。

[参考文献]

-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文献资料(上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 [7]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接管上海亲历记[Z].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7.
- [8]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9]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专题与回忆(下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 [10]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为了美好的明天(第99辑)[Z].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部,2001.
- [11]胡立教等.上海解放一年:第一部分[M].上海:解放日报出版社,1950.
- [12]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 [13]张承宗.晓诸天上——往事回忆及其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14]方晓升,张云.上海解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5]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2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6]李玉荣.中共接管城市理论与实践[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寒江

^①参见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探索》1993年第1期。所谓“总体性危机”是指:一方面,晚清之后,中国陷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与军阀混战连绵不绝的混乱境地,中央政府权威日渐式微,现代化的步伐步履唯艰;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众的力量处于“一袋马铃薯”的状态,不能完全凝聚起来。

productivity of potential laboring population must be stimulate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dress the negative externality problem of privatization of population production by fundamentally improving productive relations to raise people's fertility desire.(GONG Xiao-ying GAN Mei-xia QIAO Wen-xuan)

New Explora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of Marxism Theory, 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Theory: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theory, Western theory and Chinese theory is a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in New China, which is also a matter concerning how to construct contemporary China's advanced culture and value system and its trend. The relationships of three knowledge systems are analyzed from the mutual collision and conflict to dialogue and mut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eventually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s also discussed. The thesis recognizes the innovative insights and views of Zhang Dainian, Fang Keli, Yang Chengxun, Cheng Enfu and others on Marxism, Western and Chinese theories, and persists in the principle and position of the three delimitations, (Three delimitations refer to the delimit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total westernization, the delimit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Chinese theory-based view which denies Western theory and eliminates Marxism theory, and the delimit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the integrated view which attempts to combine Marxism, Western and Chinese theories as well as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contribute to consciously uphold the Marxist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inherit excellent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bsorb positive parts of Western culture, and keep paces with times and stay tolerant to diversity of mind to develop an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Marxism.(FANG Shi-nan YANG Zheng-zheng)

On the Scientificity of Paradigm "Marxism Theory for the Soul, Chinese Theory for the Body, Western Theory for Use"—Based on the "Trinity" Formula and Related Discussions: The view of "Marxism Theory for the Soul, Chinese Theory for the Body, and Western Theory for Use" objectively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for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Marxism Theory for the Soul" means that Marxist economics is the soul due to its scientific and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Chinese Theory for the Body" means that socialis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basic components due to its innovation and guidance power. "Western Theory for Use" means to draw on reasonable el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due to its rationality as well as its phases and shortcomings. "Marxism Theory for the Soul, Chinese Theory for the Body, Western Theory for Use" not only is the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economics, but also resonate in other subjects.(ZHANG Xin-ning)

To Rethink the Promot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Innova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 Studies of Cheng Enfu, Yang Chengxun and Other Scholars: What kind of economic theory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ffects the future of China. Westernized views in economics constantly appear.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theory for the soul, Chinese theory for the body, Western theory for use, Confucianism as the base", persist in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nd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the principal part, enh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reality questions, scientifically draw on the useful component of western economics and transform it on the combination with China practice, and fully absorb the outstanding content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and create with times character. As a resul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China's economics and the urgent requir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enrich and develop socialist economic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MIN Xu-guo XU Zhong-wei)

The Course of Deng Xiaoping Proposing the Diplomatic Thinking "Two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Significance: Entering the new period,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has deeply changed. With rich political experience and acute insight,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with Deng Xiaoping at the core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analyzes the changing time tide and world situation but forms a series of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strategie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and surrounded by the major questions, how to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what foreign policies should be made out accordingly. The diplomatic thinking "two transformations" which was put forward in 1985 is one of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It has been proven that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course of "Two Transformations" accurately answer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questions, such as, what are the historical status and strategic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reatly promote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fore, "Two Transformations" is an important key to understand development course of CPC diplomatic thinking since new period. (DONG Zhen-rui)

Study on Shanghai City Takeover at the Initial Period of New China: At the later stage of War of Liberation, to take over the big cities wa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become the party in powe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lay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ignificance and particularity of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In order to completely and smoothly take over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thorough preparation and arrangement. However, with unfamiliar city environment, sharply changing society and the transition of CPC, the takeover needed to face new situation and new contradiction.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the new regime was inevitably confronted with various adaptations, combats and even compromises. (YANG Li-ping)

Practice, Text and Marxism—From Deng Xiaoping back to Mao Zedo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